

国际格局转折中的中国应对

□ 杜起文

去年以来，世界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观察国际问题的传统角度和思维模式受到冲击。然而，放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国际形势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清晰可见。经过冷战后长期量变积累，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调整已经处于新的转折点。

反全球化逆流涌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呈现新特点

2017年的国际形势演变，在特雷莎·梅宣布英国启动“硬脱欧”模式和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冲击波中拉开帷幕。英国脱欧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历史性挫折，也给欧盟走出危机的前景蒙上阴影。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将是美今后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1月23日，特朗普上任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与墨西哥、加拿大重开北美自贸区（NAFTA）谈判，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再次受到强烈触动。各方密切注视着特朗普政府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道路上会走多远，同时

担心其对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世界经济复苏蹒跚乏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3.1%和3.4%，低于过去35年全球平均增速。与此同时，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进一步下降为1.7%，不到1990—2008年年均增速的1/4。展望2017年，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全球经济可能低位回升，增速比2016年有所提高，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仍然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在总体低迷中也出现了一些亮点和新的发展趋势，新一轮增长的动能在孕育和聚集。第一，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恢复增长势头。据IMF预测，2016、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4.2%和4.6%，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3/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国家。第二，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间区域和跨区域合作蓬勃发展。2015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4722亿美元，累计双向投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有力推动中非投资合作，2016年上半年双方签署投资合作项目超过460亿美元，建设中的一大批公路、铁

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项目将从根本上改善非洲经济的发展条件。“一带一路”合作的一批早期收获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第三，创新发展受到重视，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拉动作用开始显现。2015年，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1%。

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出现新态势，多极化深入发展

之前，美奥巴马政府在围绕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同俄罗斯的较量中收获有限，困境凸显。推动亚太“再平衡”，围堵中国的计划接连受挫。美对中俄“双遏制”，加速中俄战略走近。中东乱局延宕加剧恐暴外溢和移民浪潮，继续冲击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总体而言，中东、东欧和亚太地区格局都在朝不利美维护主导地位的方向调整。在经历2016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后，人们对新的一年美欧国内形势演变充满担忧和焦虑。各方一致看法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成为影响地区和全球稳定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最大的不稳定源。

近年来，美联盟体系内部裂痕不断加深和显现。2016年，历来被视作美在西亚地区重要盟国的土耳其其与美分道扬镳，沙特、埃及等中东传统盟

友与美进一步拉开距离。特朗普就职前夕公开谈论“北约已过时”，“欧盟是德国的工具”，要求盟国增缴“保护费”。欧洲媒体惊叹，“一切重要的东西都被颠覆了”，“西方联盟出现碎片化倾向”。在东南亚，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坚决不做美国的“小跟班”，积极同中国发展关系，融入区域合作。特朗普当选后，日本安倍政府表现得惶惶不可终日，原因就在于作为美在东亚联盟体系的最重要的伙伴和受益者，日本已经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危机。1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指出，冷战后美的全球支配地位在国际形势演变中渐渐归于终结。下一步，人们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将给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带来何种新的因素和变化。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事务中影响力上升，全球治理理念之争受到重视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取得巨大成功，G20成为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2016年1月，在冲破美国长达6年的阻挠后，IMF投票份额改革终于生效。中

国在新份额中占比从3.996%增加为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为第三位。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化进程提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顺利运行，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加强协调合作，积极扩大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

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西方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抬头的背景下，围绕全球治理理念的分歧和斗争越来越为各方所重视。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和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关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国际舆论高度赞扬习近平主席在这些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上全面深刻阐述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看法和主张，认为其有助于国际社会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辨明方向，增强信心和补充正能量。

中国步履稳健，国际影响力继续提升

2016年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显著

成绩，国际地位和影响大幅提升的一年。中国经济克服严重下行压力，实现6.7%的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1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投资1617亿美元，首次超过吸引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预计全年赴境外旅游1.4亿人次，出境旅游消费1100亿美元。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南亚、南亚邻国以及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国家的中长期投资合作蓬勃发展。在低迷动荡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中国经济砥柱中流，发挥了“稳定器”和“发动机”的作用。

国际战略学界认为，在当今世界大变革背景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在深层意义上，是关于改革的竞争。谁在改革上起步早、路子正、效果好，谁就能在新一轮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美等西方国家的国内乱象客观上反映出这些国家对深层次改革的迫切需要，但缺乏推进改革的社会共识和相应的领导力，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困扰美欧社会的核心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在推进改革、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迈出充满自信的步伐，赢得越来越多钦佩和赞赏的目光。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兴趣日益浓厚，并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听到“中国声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战略视角

国际话语权建设中 几大基础性理论问题

□ 张志洲

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需要有战略性筹划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论上对国际话语权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则是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近年来，国际话语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媒体舆论与学界对于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对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尚较浅显，有的研究脱离了现实语境，有的认识似是而非。为推进我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本文力图阐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几大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在中文语境中，“权利”和“权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词，都可以简称为“权”，但前者如“生存权”“发展权”“人权”之权利，其相对应的英文词是“right”，通常是个法律概念；后者如“政治权力”“软权力”“权力和威望”“由权力界定利益”中的权力，其对应的英文词是“power”，通常是个政治学概念。话语权本身是个外来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语词“pouvoir du discours”。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就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话语权”一词，这里的“权”即权力（pouvoir），与他“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话语权”一词的本质。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即通过话语来获得权力，它与军事、经济等物质性权力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当今世界，中国并不缺乏国际表达的自由权利及其合法途径，而急需加强的是“话语权力”。

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与国家实力成正比。如美国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其也拥有最强大的国际

话语权。因此，当前中国无需有国际话语权发展战略，只要坐等经济、军事等方面国家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自然会随之强大起来。然而，这种论调只是片面理解了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国家实力强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国际话语权并不按照国家实力大小来分配。如在某些领域，一些小国由于善于设置议题或站在道义制高点而拥有更强的话语权。第二，不同国家实力的构成结构不同，仅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等物质性实力，而缺乏强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影响力也难以赢得强大的国际话语权。第三，国际话语权可分总体性国际话语权和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是对总体性国际话语权结构的表述，而在气候、反恐、核不扩散等具体问题领域，各国的国际话语权大小则各有不同。一个国家在某一领域的话语权强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问题领域的话语权也强。

国际话语权与对外话语体系的关系。首先，一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优劣，会影响到其赢得国际话语权的状况。通常而言，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有高认同度的对外话语体系容易赢得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由于一国的对外话语体系是该国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利益关切、对外战略等诸多因素的反映，因此其可能增强也可能削弱该国的国际话语权。其次，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维护或推广本国的理念、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并进而引导国际话语主流。但掌握强大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其对外话语体系未必就是合理和先进的；同理，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小的国家，其对外话语体系则完全可能更加先进。再次，国际话语权虽然是以话语为

载体的权力，但是由话语或话语体系本身带来的“话语性话语权”只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样式，其他的样式还包括结构性话语权（一国在国际权力结构和价值观念结构中的地位带来的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一国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重要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安排中，尤其拥有的影响力而带来的话语权）等。国际话语权建设不仅要重视“话语性话语权”，还要重视如何获得结构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等其他国际话语权样式。

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点与基础。国际话语权既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总体性的话语权份额，也可以用来指国家在单个层面、单个问题领域的话语权状况，如地区安全、网络规则、环境保护、政治制度等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目前，对于我国来说，首先要对重点加强哪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有清晰的目标，没有重点、不分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肯定是不行的。其次，虽然各层面、各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诉求看似纷繁杂乱，但仍然有一个最为基础的领域，即政治话语权。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最为尖锐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领域。因此，政治话语权应该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核心，其中学术话语权更是基础。新近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亚洲再平衡”等，都是与西方学界相关联，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攻击和西方学界命题的挑战，中国也要注重从学术上予以回应，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赢得话语权。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不容忽视。

国际政治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用“黑天鹅”来形容那些具有意外性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时，通常指向那些比较少有的有负面影响的事件，比如“9·11”、美国金融危机等。令人不解的是，“黑天鹅”在2016年频频飞出，以至于快要形成“黑天鹅湖”，给人以天下要大乱的感觉。

“黑天鹅”现象反映了认识论上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是无限的。当人们用已有的知识、经验、理论、方法等来观察现实世界时，往往受这些东西的束缚，而现实世界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自然界的运动变化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大量偶然现象中寻找必然性，对事物变化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分析和预测是有学理、有逻辑的，不同于算命先生的忽悠，也不同于赌徒的下注。对于国际政治来说，鉴于其无政府特性、行为主体多元、影响因素庞杂，研究者所掌握的信息更加有限，所以准确预测难度更大。尼克松和布热津斯基曾预测到冷战的结局，有《一九九二：不战而胜》和《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为证；但是他们都没预见到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即冷战结束后，美国还打算同改旗易帜的苏联长期和平共处，一同管控世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黑天鹅”未被预见到，或者是大量的预测是错误的。有多少西方学者曾预测中国崩溃？又有多少人预测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但他们都错了。

“黑天鹅事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不确定性上。因为它是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所以就未作应对准备；更因为它是不合常规的，所以它将怎样发展变化就更难确定。对一个国家的决策层和智库来说，能预测出“黑天鹅”固然很有意义，因为这样可以使决策者对“黑天鹅”可能造成的影响早作应对预案，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已经出现的“黑天鹅”的应对。对“黑天鹅”的应对是否得当，会影响国家的战略走向乃至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9·11”后，美国新保守派试图将危机变机遇，认为美国的“单极时刻”到来了，美国可以借反恐来号令天下，打造单极世界。然而，两场反恐战争打下来，美国的实力大大受损，美国相对衰落成了不争的事实，单极世界成了越来越遥远的梦。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来应对危机，效果良好，美国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在应对“黑天鹅”上，需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奉行宿命哲学，对“黑天鹅”可能带来的影响消极等待，听天由命；二是对“黑天鹅”过于敏感，将“黑天鹅”视为是针对己方的战略举措，进而要先发制人，从而招致不必要的对抗，引火烧身。

邓小平当年应对苏东剧变的箴言为我们提供了应对“黑天鹅事件”的正确战略思维。面对比过去“复杂得多，乱得多”“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国际形势，首先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面对“黑天鹅”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采取积极的态

『黑天鹅』

如何影响国际政治

□ 刘建飞

度，要有作为。这种作为首先体现在冷静观察上。对战略对手不按常理打出的牌，要分清哪些是针对己方的，哪些是普遍性的；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哪些是于己有害的，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看似有害，但应对好可以转化为机遇的，哪些是表面看有利，但实则隐含严峻风险的。与此同时要稳住阵脚。在战略博弈中，进攻方往往是寻找对手的弱点、软肋出手。如果己方先乱了阵脚，就会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只有稳住了阵脚，才能沉着应对。

专家视点

